

## 中亚东干语的演变及其方言岛成因探究

陈吉文\* · 罗敏球\*\*

### 目 录

1. 前言
2. 东干族与东干语方言岛概览
  - 1) 族名与人口
  - 2) 语言特点
  - 3) 文字演变
3. 东干语方言岛的形成原因
  - 1) 移民运动与军事战乱
  - 2) 宗教信仰与民俗差异
  - 3) 生活环境与经济限制
  - 4) 文化水平与语言劣势
4. 东干语方言岛的展望
5. 结论

### 中文摘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中亚东干族语言的历时演变及其跨境移民特殊方言岛的形成原因。东干族源于晚清时期因民族冲突和政治因素，自中国西北地区迁徙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一带的陕、甘地区回族，在历经百余年生生不息地发展壮大下，逐渐形成的一个兼具中国西北文化基因与中亚地域特色的独特民族。其所使用的东干语是以中国西北地域汉语方言为基础演化形成的特殊变体汉语方言。后来东干学者借用西里尔字母发展出书写系统，传承至今。

本文继而解析了东干语特殊方言岛的形成原因：随着东干人的迁徙，使西北方言脱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일반대학원 한중문화학과 박사과정(제1 저자)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중국언어문화학부 교수(교신저자)

离源语言区，因地理隔离、文化断裂、加之聚居地封闭、与族群内婚制传统构建等因素，语言发展受阻，与周边俄语、突厥语等语言环境形成割裂，长期演化为被“包围”的语言孤岛。

文章最后对东干语方言岛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期望通过这一跨境移民方言岛的案例，为特殊语言的保护与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东干族，东干语，方言岛，回族，中国西北汉语方言，陕甘方言

## 1. 前言

东干 (gān) 族 (俄语: дунгане/Dungane) 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根据林涛的考察表明：“中亚东干族的主体是1862-1877年 (清同治-光绪年间) 陕甘宁回民大起义<sup>1)</sup>义军的后裔。<sup>2)</sup>”该民族是从中国晚晴时期，由于民族冲突与政治矛盾等原因，自中国西北地区迁居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一带的陕、甘、宁地区的回族，在生生不息地繁衍与文化沉淀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兼具中国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的中亚独立民族。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中亚多国在教育方面交流日趋频繁，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东干族留学生陆续赴中求学，主要集中于西北师范大学、

1) 陕甘宁回民大起义，又称同治陕甘回乱、同治陕甘回民事变，是在1862-1873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陕、甘一带的大规模回民动乱 (清时期现宁夏回族自治区属甘肃省宁夏府、固原州)。由陕、甘回民和哲合忍耶苏菲门宦 (哲合忍耶派是中国伊斯兰教苏菲主义中传播最广，信仰者最多的门宦 (苏菲派别) 之一，也称为“新教”。起源于中亚的纳克什班迪教团，公元18世纪由马明心引入中国。(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修订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金宜久，《伊斯兰教小词典(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 起事开始，主要为回、汉以及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大规模屠杀、财产转移等冲突。1868年十月，陕甘总督左宗棠 (1812-1885) 坐镇西安开始平乱，直至1873年九月，随着肃州战役的落幕，事变结束。(张中夏，《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

2) 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西北地区高校。笔者在跟西北师大的东干族学生学习交流中注意到，他们在日常对话中夹杂着陕、甘地区方言词汇与语调<sup>3)</sup>。因此，对他们的语言产生了好奇，并有了浓厚的探究兴趣。

东干语是东干族操有的民族方言，是随着东干族的形成，在其他语言的包围和竞争中顽强绵延了近160年的一种具有中国西北地区汉语特点的独特语言<sup>4)</sup>。东干族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同根同源，因此其语言本质属于汉语地域方言在境外的演化变体。相关语言特征将在后文中进一步呈现。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一词是由“社会学” (sociology) 与“语言学” (linguistics) 复合而成，是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是从社会的角度解释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的学科<sup>5)</sup>。简言之，社会语言学就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语言。相较于侧重语言本身的传统语言学 (结构主义、生成语言学等)，社会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加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与现实变化，将语言视为一种动态的、受社会因素影响的产物，因此更加适合研究语言的变异性。本文将借助社会语言学视域，探讨东干语及其发展演变；总结东干语方言岛的形成原因。

中国的社会语言文化体系之繁杂，主要源于三重结构性因素。其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东干族的母系——回族作为56个民族中使用汉语的民族之一，有着独具特色的社会语言文化体系；其二，中国是典型的多方言国家。就汉语而言，内部方言繁杂多变、差异显著。例如同为东干语源头方言——陕西话与甘肃话，虽同属西北方言体系，在语言语调、用语习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其三，中国境内语言与周边国家地区语言多有融合发展。构成中国境内语言与周边国家地区语言互动的方式包括“走进来”与“走出去”两种基本模式<sup>6)</sup>。东干语正是随着中国回族的迁徙汉语方言“走出去”的结果。

3) 比如：“做 (zì) 撒尼 (做什么呢?)”、“吃饭咧么? (吃饭了吗?)”等。

4) 侯宇，〈中亚东干语传承危机与保护路径探析〉，《丝绸之路》第4辑，2023年。

5)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走进来”指他国人口迁入中国后，与本土语言发生接触、碰撞与融合产生的语言发展与变迁；“走出去”指中国境内人口外迁，与他国语言环境接触产生的语言变化。

关于东干族与东干语的学术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语法结构与翻译策略等语言研究。例如，刁俊丽（2023）针对东干语文学作品中的“叫”字句进行了句法分析<sup>7)</sup>；司庸之（2002）在东干语翻译再推敲方面进行了探讨<sup>8)</sup>。二、民间故事、口歌、曲艺、猜话、小说等民间艺术与口头文学等方面。曹茜茜（2023）通过比较东干文学代表人尔里·尔布都的小说《三娃儿连莎燕》与中国经典爱情悲剧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揭示了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与差异<sup>9)</sup>；齐雪艳（2023）从东干诗人亚瑟儿·十娃子的诗作中发现，东干人对中华文化有一定的认同意识<sup>10)</sup>。三、传统文化与民间习俗。王瑞（2019）调查东干族传统服饰保存与传承现状后表明，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东干人思想观念的更新，传统服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sup>11)</sup>；李如东（2024）对目前东干族的婚俗文化进行探究后指出，如今东干族的婚姻成为了一种糅合多种文化元素的复合仪式<sup>12)</sup>。以上反映了该群体在地化诸多变迁的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地域文化“走出去”在境外的演变过程。四、针对东干族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与二语习得经验总结。尤其在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教育相关便利政策下，随着东干族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围绕其汉语习得与教学策略的探讨亦日渐丰富。由于该领域跟本文相关性较弱，故不再赘述。

早期受限于历史与政治原因，学界对中亚东干人的关注与了解相对有限。随着全球文化交流与学术会议开展日益频繁，有关研究逐渐增多。然而，多集中于语言结构或文化等单一维度，针对东干语语言特点及其方言岛形成原因的综合研究仍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关于东干语的词汇、语法、翻译等

7) 刁俊丽, 《东干语文学作品“叫”字句研究》, 北方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3年。

8) 司庸之, 〈东干语翻译再推敲〉, 《昌吉学院学报》第3辑, 2002年。

9) 曹茜茜, 〈探析《三娃儿连莎燕》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女性形象〉, 《大众文艺》第11辑, 2023年。

10) 齐雪艳·吴晓杭, 〈论亚瑟儿·十娃子诗歌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 《边疆经济与文化》第3辑, 2023年。

11) 王瑞·王东, 〈中亚东干族传统服饰保存与传承现状调查〉, 《民族艺林》第1辑, 2019年。

12) 李如东, 〈在地化与礼仪变迁——中亚东干人婚姻礼仪之争中的社会、文化与族群观念〉, 《开放时代》第4辑, 2024年。

语言层面研究,以及关于东干族文化现象、社会习性、民族心理归属等社会文化层面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各国频繁交流中相关东干族的新闻报道、网络个人媒体田野考察记录等资料,梳理东干语的发生与演化;并尝试从人口迁移、文化隔离、生活环境及社会发展等角度,浅析东干语方言岛的成因。

本文旨在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东干语的同时,亦试图通过探讨东干语方言岛的形成原因,来揭示汉语在异质语言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与变异路径。同时,由于东干语其文字系统的外源性重构(西里尔文)等特殊性的情况,该“方言岛”的情况超越了传统定义的单一地理维度,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方言岛的界定。因此,希望在跨国“方言岛”研究方面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尤其希望能够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沿线语言互动与变迁提供案例。

## 2. 东干族与东干语方言岛概览

东干族起初遵循传统的回族婚礼仪式,严格实行内婚制<sup>13)</sup>习俗。这一封闭性婚姻结构影响了东干族在语言与传统文化习俗方面的发展。因此,也恰好得以保留了诸多百年前中国西北地区方言特征与回族及华夏穆斯林文化传统。

### 1) 族名与人口

东干族又被称为东干人。起初,“东干”一词是突厥语系民族和斯拉夫人对中国回族的通称。在“NAVER\_사전”中查询“回族”词条时,释义为“돌궐족(突厥族)의 이칭(异称).(译:突厥族的异称)”,同栏“中韩词典\_单词·俗语”中释义“회족.(=东干)(译:回族(=东干))”<sup>14)</sup>。反映出部分学者对中亚族群关系的认知有一

13) 内婚制是一种约束男女必须在某一特定社会阶层以内,或某社会团体中,或宗族内,或家庭内,选择配偶的婚姻制度。东干族起初绝大多数人只跟自己民族的人结婚。

定偏差，存在“回族”称谓混用情况，对东干族了解不深，因此将“回族”、“突厥族”、“东干”释为同一概念。

1877年白彦虎<sup>15)</sup>率部众入俄后，“东干”成为这部分移民及其后裔的专用称呼；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这支回族穆斯林被承认为苏联的一个民族；1942年正式以“东干”一词为该民族命名<sup>16)</sup>。然而一直以来，该族群自称为回族（东干语：Хуәй зүй）、回回、或老回回<sup>17)</sup>，认为“东干”是他称，且带有歧视意味。

关于族名“东干”的由来与含义，目前没有确切定论。有说法认为其可能源于突厥语，意为“定居者”或“居留者”的意思；也有认为来自过去西北方言，如“东甘<sup>18)</sup>”的讹传，或是“东安”、“东岸”的音转等等<sup>19)</sup>。在与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的交谈中，有人将“东干”解释为“东边过来干活的”的简称，这种说法显然是学习了汉语后的望文生义。出现这一民间解释主要原因在于：当初东干族移民中大部分人与迁入地居民之间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与较大的文化差异，主要生活在农庄，从事务农等体力劳动。有东干族留学生认为：“东干”的“东”指东方的中国，“干”可能是突厥语或蒙古语。”通过与多名学生的讨论，他们倾向认为，“东干”一词可能来源于突厥语或蒙古语，意为“移民”或“流亡者”，这一解释符合东干族是19世纪因战争与政治动乱迁移到中亚地区的中国回族穆斯林这一历史事实。

东干族整体人口数量缺乏确切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根据多方相关资料记载：1877年至1884年进入中亚的东干人约1.5万人；1979年苏联第4次人口普查登记的东干人有52,152人<sup>20)</sup>。此后很难查到关于东干族整体人口数量的官方权威统

14) 词条来源：

<https://dict.naver.com/dict.search?query=%E5%9B%9E%E6%97%8F&from=tsearch>(检索日期: 2025.04.08)

15) 白彦虎（东干语：Бай Янху，1830-1882年），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陕西泾阳人（其籍贯另有西安、渭南等十多种说法），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变的回军首领之一。

16) 莫超，〈“东干”族名稽考〉，《文化艺术研究》第1辑，2024年。

17) 库吐乐阿依·居来提，〈东干族留学生初级阶段汉字学得偏误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18) 甘肃东边、汾河东边，也有敦煌与潼关之意。

19) 莫超，〈“东干”族名稽考〉，《文化艺术研究》第1辑，2024年。

20) 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计。结合零散的网络资料，东干族人口数量记录情况大致如下表所示：

〈表 1〉 东干族人口记录

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俄罗斯
66140人(2015年)	62000人(2014年)	2542人(1979年)	801人(2002年)
总人口约计15万			

资料来源于：《中国新闻网\_走近东干人：东干人口15万主要分布于楚河两岸》<sup>21)</sup>

对于东干族人口数据统计主要存在以下困难：首先，该民族人口分布在中亚多个国家，很难进行统一普查，尤其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东干人较少，1979年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后一次官方公布数据，此后未有更新；其次，随着东干族内婚制的破除，允许与外族通婚后，家庭成员的民族成分统计和申报存在变动，这使得针对东干族人口的精准普查变得困难且意义不大。当下根据早期官方数据简单相加所得的人口总数并不准确。然而因东干族前期长时间维持内婚制习俗，可根据近160年以来东干人各居住地人口自然增长情况，按世代推算其人口规模。根据旅行家“飞行游记”在2024年9月对吉尔吉斯斯坦伊尔迪克乡东干村的走访调查结果，推测东干族大概繁衍了7至8代<sup>22)</sup>。依据上述方法粗略推算，目前东干族人口应在18-20万人之间。

## 2) 语言特点

东干语的母源是中国晚晴时期西北地区的汉语方言，经长期与境外诸多语言接触碰撞后，形成了特殊的变体语言。<sup>23)</sup>东干语的书面语基本以甘肃方言为基础，并以20世纪初以来的东干文学作品语法为规范，语音则主要以甘肃话作为标准音<sup>24)</sup>。

21) 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m/gj/2016/11-08/8056669.shtml>(检索日期：2025.04.08)

22) 飞天游记的作品：<https://v.douyin.com/-nAkYG4q-Zo/>(检索日期：2025.04.08)

23) 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根据东干族迁出中国前的籍贯，东干语大致形成了甘肃话与陕西话两大方言类型：陕西话系东干人多分布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甘肃话系东干人多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此外，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江布尔等东干人聚居地区，陕西话与甘肃话两种方言并存<sup>25)</sup>。无论是陕西籍东干人还是甘肃籍东干人，就如同在中国境内陕、甘地区的方言关系一样，他们的语言可以互相流通。

从语言形态学分类来看，作为汉语的变体方言，东干语属于词根语；从语言的发生学来看，东干语属汉藏语系汉语北方方言西北支方言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在不断融合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大致呈现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1) 词汇杂糅：东干语在长期与汉语语言环境隔绝的情况下，词汇方面恰好保留了百年前汉语西北方言的“原汁原味”。刘世俊认为：“东干语是一种保留在中国境外的汉语方言，由于特殊的语言环境，它得以保持百年前的汉语西北方言的风貌，是饶有价值、弥足珍贵的方言资源。<sup>26)</sup>”例如，在日常会话中“Вэ нян фуэ у (我念书去。)", 正是中国西北地区过去的说法，一般常说“我上学去。”；又如下表列举的百年前中国使用的旧称谓词汇，在如今的东干语中仍继续使用。

〈表 2〉东干语词汇与现汉对照表

东干语 (西里尔)	东干语词源	现代汉语
жуанзы	卷子	花卷
ляньшоу	联手	朋友
дэжо	待诏	理发师
ямьин	衙门	公安局/政府机关
й иншыин	营生	生意/工作
дажын	大人	法官/官员
хуая	画押	签名

资料来源：林涛，《东干语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4年版。

此外，东干语词汇中还保留有大量陕甘一带的方言词，例如“шүә (星宿-

24) 林涛，《中亚东干语的特点、现状和发展趋势》，《当代语言学》第2辑，2016年。

25) 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6) 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星星) ”、“чишанма (圪崂崂-地方) ”、“шыңлин (牲灵-牲口) ”等<sup>27)</sup>。俗语“Шығә й уәшон хан дада. (十个月上喊大大(爸爸)) ”中,对父亲的称呼为“да(大)”,这正是典型的陕甘地区方言词汇。随着近几年东干人与中国的接触交流增多,东干语不断吸收现代汉语的标准词汇与流行语,新旧词汇常糅合使用,此外在东干族内部,不同地区的方言词汇也有糅合使用现象。笔者与东干族学生接触交流中发现:操陕西方言的东干人,经常夹杂甘肃(河州)和宁夏(固原)一带的方言词。主要原因在于来自不同地区的东干人通婚后对家庭语言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了保留古汉语词汇外,东干语也借用了部分现居地语词。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需要,东干语吸纳了部分突厥语、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他族语言词汇<sup>28)</sup>,例如国家名“Швей цария(瑞士<借自哈萨克语>)”等名词多为他语借用词汇。但在东干语词汇总量中,外来词总体占比不超过15%<sup>29)</sup>。

总的来说,东干语在用词方面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古今词语并存杂糅、多语借词杂糅、以及东干族不同地区方言词汇杂糅,呈现出词汇来源异常丰富的面貌。

(2) 语音变异:东干语语音发音最大的特点是元音发得比较长,而辅音发得相对短,整体听上去发音饱满清晰<sup>30)</sup>,例如在日常会话“Ә-ә! Зали? Бу ләли и? (哎哟,扎里?……不来咧?“意为:“哎哟,怎么了?……不来了?”) ”中元音拖长的特点就很明显。此外,还存在不区分前鼻音韵尾n/ŋ/和后鼻音韵尾ng/ŋ/的现象,如/un/与/ong/不分,/en/跟/eng/不分,/in/和/ing/不分等发音情况。例如将“春天”发音为“чунтян [tʃun tʃan]”,与“冲天”相混淆。其次,东干语在他语借词结合过程中,借用西里尔字母/P/的弹舌音,增加了一个类似于当

27) 李阳阳,《东干语词汇研究》,北方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28) 新生事物类名词东干语一般会择取当地词汇使用,因此哈语等突厥语系词汇被吸收;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解体中亚国家,俄语作为普遍通用语言,东干语中又有部分俄语词汇。东干人基本信奉伊斯兰教,作为穆斯林在学习宗教典籍时,还吸收了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语词。

29) 林涛,《中亚东干语及其发展状况》,《北方语言论丛》,2011年。

30) 刘俐李,《东干语(陕西支)声调共时差异实验研究》,《民族语文》第5辑,2013年。

地语言的卷舌颤音[r]音位，导致现下东干语相较其源头陕甘方言听上去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哈萨克斯坦部分东干语方言岛的发音在保留陕西话特点的同时，趋向靠拢于甘肃话。

东干语起初更多的是口耳相传，这使其更容易发生生物学角度的长期语言累积变化，也就是生物语言层面的变异。以及与地方言的糅合使用和语言转用，也使其整体灵活多变，且受现地方言本身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东干语虽采用西里尔字母拼写汉字词汇，但其对应读音也不完全跟陕甘方言保持一致，如“тянтян [tjan tjan]（天天，意即“成天、每天”）”，其发音与陕甘方言存在明显差异。同样也有文白异读现象，如“цымы й хуар [tsu mi xwar]（白读：刺薇花儿；文读：刺玫花）”。声调方面，东干语只保留有以西北汉语方言为基础的三个声调（阴平与阳平合二为一）<sup>31)</sup>另外，十月革命前，东干语中的俄语借词有两种拼写方式<sup>32)</sup>，例如“茶壶”一词，可拼作“самавар”，也可按照俄语正字法拼写为“самовар”<sup>33)</sup>。这种书写上的差异也反映出当时发音标准的摇摆。上述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东干语的语音呈现出较原始方言更显著的变异性。

(3) 书面语口语化：东干语的书面语受口语的强烈影响，书面用语风格极其口语化，且带有浓郁的中国西北地域风情。例如列宁的名言“Няни! Няни! Я о няни!（念呢！念呢！要念呢。意即“学习！学习！再学习！”）”，直接采用西北方言的口语表达。此外，东干语中还有丰富的口语化俗语，如“Жын чян зыжэ эрху, жын ху зыжэ пәнён.（人前指教儿子，人后指教婆娘。）”、“Ма ю бёли - ца дани, жын ю чянли- хуа дани.（马有膘了，嘶大咧；人有钱了，话大咧）”、“Бу жян тузы - бә са й ин.（不见兔子——叵撒音）”、“Ян фигуэчи лю шынни, жын гуэчи лю минни.（雁飞过去留声呢，人过去留名呢。）等等<sup>34)</sup>，这一系列带有浓厚口语色彩的语汇常被直接

31) 林涛，〈东干语与北京话及西北方言的比较〉，《北方语言论丛》2012年。

32) 或按照东干语的发音写，或按照俄语书写规则写。

33) 杜松寿，〈东干语词儿书写规则〉，《拼音》第2辑，1956年。

34) 例句摘抄与网络视频：〈东干文学：汉语拼音化的奇葩〉，澎湃新闻。

用于文学创作中。究其原因：起初东干人大多文化程度较低，难以编纂书面著作，文化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后来有文字能得以记录时，便按照日常会话创作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得到族群受众的认可后，口语化的书面语言风格便成为一大特色，并得以发展与传承。因而，东干语的书面语言大多简洁朴实，富有生活气息，阅读时有强烈的口语感染力，也因此更容易产生共鸣。

### 3) 文字演变

最初来到中亚的东干人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尤其能进行书写记录的人比较少。因此，汉字并未能跟随人口迁徙在东干族中发展成为主要文字<sup>35)</sup>。作为穆斯林，有少数东干人能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小儿经”<sup>36)</sup>，故而在初到中亚时，东干族学者们曾试图借用阿拉伯字母来为本民族创制文字<sup>37)</sup>。由于阿拉伯字母与现地语言文字割裂较大，不利于学习与吸收当地语言文化；以及东干族内部能够系统使用并发展阿拉伯字母作为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人才力量也比较薄弱，无法将之孕育为成熟的言语载体。因此，并没能发育成为东干语的正式文字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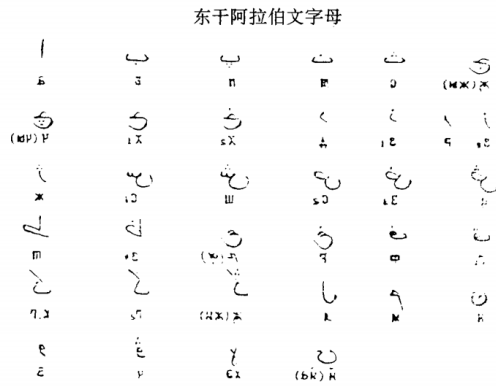
---

[https://m.thepaper.cn/kuaiobao\\_detail.jsp?contid=1676315&from=kuaiobao](https://m.thepaper.cn/kuaiobao_detail.jsp?contid=1676315&from=kuaiobao)(检索日期: 2025.04.08)

35)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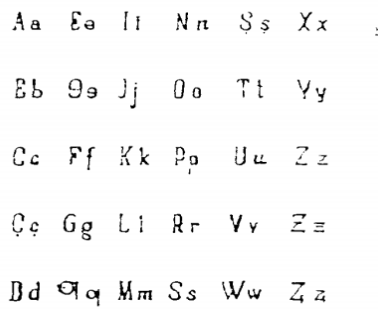
36) 小儿经或小儿锦，简称小经、消经。是运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仅兰银官话与中原官话）的一种非正规书写文字。主要是被中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穆斯林群体为了教导启蒙儿童学习《古兰经》所运用的。

37)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图 1> 东干阿拉伯字母 (『东干文化研究』)

二战前后，随着全球化发展，东干族在借用阿拉伯字母创立东干文字的经验基础上，又尝试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东干语（1932年第二次突厥学代表大会决议决定），无疑是东干文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sup>38)</sup>然而，由于前苏联文字改革中开展的“拉丁化运动”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东干语拉丁化方案受到限制，未能得到广泛推行，最终夭折。



<图 2> 东干拉丁字母 (『东干文化研究』)

38)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直至1953年以后，在前苏联经济实力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由前苏联学者协助，东干人开始推广使用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拼读表音文字<sup>39)</sup>。逐渐刊印教学书籍、新闻报纸等，并一直延续至今<sup>40)</sup>。现东干语文字形态如图所示<sup>41)</sup>：

<p><b>Бый хўтер</b></p> <p>Тэйон жошон, бый хўтер, Ни тэ гошин. Ни лян жин гуон фадини, Чиди чун фын. Йисыр ни до тяншонли, Зушён бый юн. Йисыр зу до хуайяни. Ба щян хуар вын. Жяр хуардини, ва канди, Ниди щин го.</p>	<p><b>白蝴蝶儿</b></p> <p>太阳照上，白蝴蝶儿， 你太高兴， 你连金光耍的呢， 骑的春风， 一时你到天上了， 走向白云， 一时走到花园里， 把花儿画， 拣花儿的你，我看的， 你的心高。</p>	<p>Мый йнез ў д ў ю зы жиди кучуан 每一族都有自己的口传 вынцүәни。Лян йнче мивэ ў пинен 文学呢。连（像）一切民族一样 хуэпа ў минжынди кучуан вынцүә 回族民人的口传文学 дуәдихын, е задихын, тадн еифа 多得很，也咋得很（好得很），它的样法 е дуә, е че。Кучуан вынцүәсы да 也多也俏口传文学是打 минжынди кунн зуәзоч ўләди, та 民人的口里做造出来的。它</p>
--	--	--

〈图 3〉 现下东干语

在历经上述多次探索后，东干语成为唯一一种以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汉语变体方言。这一独特的文字体系不仅记录了东干语的声音，也为东干族留下了很多优秀的文学创作，以及其他语言文学刊物的翻译作品。

### 3. 东干语方言岛的形成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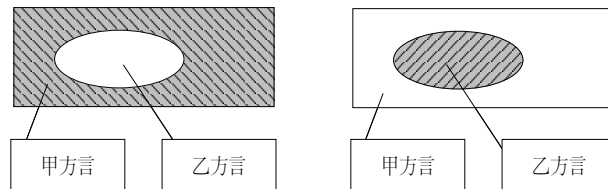
方言岛 (speech island) 又称语言岛 (Language Island)、语言孤岛或方言飞地 (outlier)，指某种方言在地理上完全被其他方言所包围的一种重要语言

39) 第一次正字法于1954年10月29日由苏联科学院吉尔基斯分院决议决定；第二次正字法于1956年由吉尔基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决议决定。

40) 杜松寿，《拼音文字研究参考资料集刊：东干语拼音文字资料》，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

41) 左图为东干族诗人亚瑟儿·十娃子的诗作节选；右图为网络检索东干语图片，检索网址：[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76315&from=kuaibao](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76315&from=kuaibao)(检索日期: 2025.05.10)

现象。一般说来，同种方言通常分布在相邻的连续地区，及相同区域使用同种语言片。当同种方言的某支在地域分布上与主体不相连属时，就形成了方言岛（或方言飞地）。<sup>42)</sup>方言岛可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当甲方言（如外来迁入方言）陷于乙方言（如当地既有方言）包围之中形成的方言岛；或甲方言反包围乙方言形成的方言岛。形成模式大致如下图所示：



〈图 4〉方言岛示意图

随着人口迁移，中国西北地区汉语方言被带入中亚，受到突厥语、俄语等现地语言包围，由此形成了东干语方言岛。但相较于传统意义层面的方言岛，东干语方言岛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本文将其界定为一种“跨境移民方言孤岛”。

东干语方言岛的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汉语方言基底结构与多语言借词系统之间的层叠共构。东干语以清末民初的西北汉语方言为内核，长期隔绝于汉语语境之外，又不断吸纳突厥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多语种词汇，形成了结构稳定而词汇动态变化的复合型语言体系。其次，是宗教文化在语言传承中的固化效应。东干语与伊斯兰文化密切绑定，其语汇系统中大量包含宗教术语与礼仪用语，不仅承载宗教意义，更在日常交际中构筑了语言使用的边界。这种宗教与语言的联动机制，在族群内部强化了语言的文化认同与传承稳固性。再次，是书写系统的异源重构。即以西里尔字母替代汉字建立独立的拼音化文字体系。此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复合语言现象，不仅拓展了“方言岛”传统概念中地域封闭的解释框架局限，也为跨境离散语言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

42)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版。

重要范例。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促使东干语方言岛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东干语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等原因，有文化、政治、宗教等社会实质性原因。其中社会原因是东干语方言岛形成的最主要因素。

### 1) 移民运动与军事战乱

移民运动是指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一定数量人口从原居地迁移到另一个生活环境的历史过程。随着移民的迁徙，当地方言也会被带到新的语言环境中。因此各个地区历史上的移民运动往往会带来语言的宏观演变，致使语言分化、融合、替代、乃至消亡。<sup>43)</sup>

通过移民运动形成的方言岛通常有两种类型：迁入方言较当地方言处于劣势，被当地方言所包围；或移民数量庞大，当地语言原本处于弱势，形成“反包围”形势，使得本地语言成为“被孤立”的一方。中亚东干语方言岛显然属于前者——随着人数相对较少的东干人的迁入，当地突厥语、俄语占据语言主导地位，东干语作为弱势方言在异地被包围，逐渐演化为孤立的语言岛。

军事战乱往往导致人口迁徙。躲避战乱与战败流亡是历史上移民运动的主动动力之一。东干语方言岛的形成与中国西北回族的三次大规模外迁密切相关，三次迁徙均与军事战乱密不可分。

第一阶段（1862-1878年）：清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回民动乱（史称“同治陕甘回乱”），其起义失败后，于1877年陆续进入俄国境内<sup>44)45)</sup>。据记载，此次迁移分为三支：吐鲁番队伍合难民约1000人，最终抵达奥什<sup>46)</sup>；

43)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版。

44) 张中夏，《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

45) 符晓洁，〈试论同治陕西回民事变的影响〉，《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辑，2015年。

46) 葛维达·茨布兹金，〈卡拉库努孜：回族在俄国的早期定居点〉，《西北民族研究》第4辑，

甘肃队伍共1130人，迁居伊尔迪克；陕西队伍共3314人，迁居卡拉库努孜<sup>47)</sup>48)。此次战败迁移为后续回族往中亚地区的移民运动打下基础。

第二阶段（1881年）：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俄历1881年2月12日），中俄签订《伊犁条约》（俄称《圣彼得堡条约》），该条约第三条内容如下：

“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应于交收伊犁以前查明，其愿迁居俄国者，自交收伊犁之日起，予一年限期；迁居携带财物，中国官并不拦阻。”<sup>49)</sup>

条约规定，居住在伊犁地区的回族与维吾尔族可自由选择国籍和居住地，并在一年内可迁居俄境。在该条约的支持下，大量回族趁机迁往中亚，主要定居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索库卢克等地区。迁移人数达万人左右<sup>50)</sup>，为方言岛的区域化形成提供了人口基础。

第三阶段（20世纪以后）：包括民国时期的内外战乱、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动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少量自发性迁徙。该期间存在政治原因等局限，人们对苏联的东干人已不太了解与关注，因此这一阶段的记录相对较少。但通过与东干族留学生交流可知：该期间部分回族因避战、逃荒或寻亲等原因迁往中亚，并与先期移民后代融合的回族不在少数。此外，前苏联解体后中亚政局频繁震荡，中亚各国的东干族互相之间亦有迁徙；以及东干人聚居区与其他族群之间发生冲突导致的被迫迁移。例如，2020年哈萨克斯坦境内由于地方冲突，约20,000东干人被迫逃往吉尔吉斯斯坦避难<sup>51)</sup>。这类现代移民潮虽规模有限，但也

2015年。

47) 有记载：清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带领5000多人撤退到中俄边境，向俄军请求入境避难。

48) 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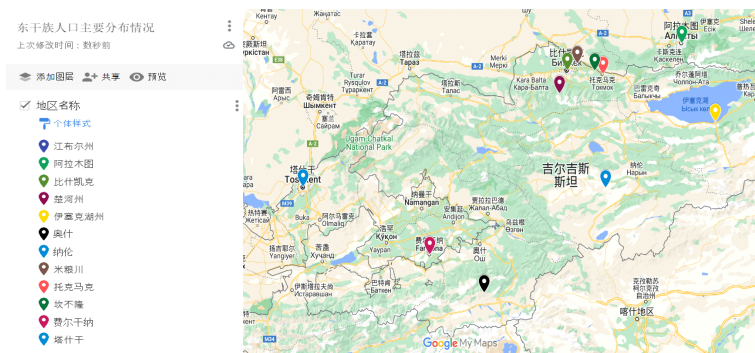
49) 《中俄改订条约与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凤凰网资讯。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bupingdengtiaoyue/news/200808/0801\\_4259\\_689826.shtml](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bupingdengtiaoyue/news/200808/0801_4259_689826.shtml) (检索日期: 2025.04.08)

50) 葛维达·茨布兹金，〈卡拉库努孜：回族在俄国的早期定居点〉，《西北民族研究》第4辑，2015年。

加剧了方言岛内部结构的动态变化。

整体来看，移民运动与军事战乱为东干语方言岛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人口迁移条件与空间隔离背景，构成方言岛生成的历史基础。下图展示了现下东干语方言岛的主要地理分布<sup>52)53)</sup>：



〈图 5〉东干语方言岛主要分布情况

图中可见，东干语方言岛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等国的边缘乡镇和农庄，地处偏远，远离大都市，呈居民点状分布。典型代表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荒漠“陕西村”，其语言环境极其封闭。这些地理特征不仅造就了东干语的孤立生存状态，也为其语言结构的独特性和保存机制提供了现实土壤。

51) RFE/RL's Kyrgyz Service RFE/RL's Kazakh Service "Kazakhs Start Returning Home From Kyrgyzstan After Weekend's Ethnic Violence", RadioFreeEurope/RadioLiberty. February 10, (2020) 02:55 GMT.

<https://www.rferl.org/a/kazakhs-start-returning-home-from-kyrgyzstan-after-weekend-ethnic-violence/30425913.html>(检索日期: 2025.04.08)

52) Google Maps 地图链接：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mid=11v9MsdROSUI2m8tjYHyRathd4S7r7dw&usp=sharing>

53) 数据来源：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2) 宗教信仰与民俗差异

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是影响语言隔离与方言岛形成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对于东干族而言，宗教文化背景不仅深刻塑造了族群认同，也间接强化了语言边界，加速了语言孤立状态的形成。

早期东干族严格遵循内婚制，这一点印证了该民族为中国回族的延续，也反映出东干语起初完全是中国西北汉语方言。迁徙前，东干族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搭河西走廊一带，宗教信仰为伊斯兰教，属于典型的“汉语穆斯林”群体。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同时受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其宗教实践方式有不同程度的“汉地化”，因此也被西方学者们称之为“中国穆斯林”或“华夏穆斯林”。<sup>54)</sup>然而，即便在中国境内的回族之间亦有差别，居住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回族穆斯林，在宗教活动与生活习性等方面也因与周边不同混居民族的文化互动而表现出明显差异。

当中国境内的回族前往中亚地区时，除了将籍贯地方言带入新的语言环境之外，还将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传统民俗等一并“打包”带走。然而，尽管中亚地区大部分也是穆斯林社会，但跟东干族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东干人延续了中国穆斯林围寺而居、群体聚居的抱团式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也多与现地不同，服饰方面差别更大<sup>55)</sup>。此外，传统节庆尽管东干族与当地穆斯林一样庆祝开斋节、古尔邦节与圣纪节等，但其庆祝方式和仪轨细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饮食方面，除了严格遵守伊斯兰饮食禁忌之外<sup>56)</sup>，依旧保留了中国西北地区的饮

54) 海峰, 〈东干语概况〉, 《民族语文》第1辑, 2002年。

55) 从关于东干族的网络田野文化访谈视频来看：婚服与婚礼现场装饰多为明清末年中国西北地区的纹样与制式。日常穿着也一般男子多戴白色小帽，喜穿白衬衫；妇女常戴黑、白或深绿色头巾，老年妇女爱戴白色或月蓝色帽子，穿黑色大襟衫袄。

56) 忌食猪、狗、马、骡等肉类，不食非清真食物（未经信仰伊斯兰教者宰杀或处死的畜禽），不食血制品等。参考：〈回族风俗习惯〉，长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http://mw.changchun.gov.cn/ztzl/ccmz/mzwh/201510/t20151029\\_1035331.html](http://mw.changchun.gov.cn/ztzl/ccmz/mzwh/201510/t20151029_1035331.html) (检索日期: 2025.04.08)

食结构，多以面食为主等。宗教行为与生活习性与本地穆斯林的差异，使东干族在文化上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造成与当地居民联系较少，难以实现与主流社会的深层融合，导致东干语很难通过跨群体传播获得扩展，新旧两种社会语言文化无法得到充分的接触与碰撞。

不仅如此，宗教信仰形式与派别不同造成的分歧，拉大了东干族内部居民点互相之间的距离。东干族内部亦存在信仰矛盾，教派分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语言的统一与融合。例如，初期东干人中有1000多人原是宁夏马化龙教派(哲合忍耶)信众，其余都是陕西老派(格的目教派)<sup>57)</sup>，虽都同属伊斯兰教体系，但派系有别，不能共居合作，也常常有矛盾冲突发生<sup>58)</sup>，从而对语言使用空间产生割裂效应。

综上所述，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上的多重差异，不仅拉开了东干人与中亚其他穆斯林群体之间的文化距离，也进一步加剧了其语言的孤立状态，成为推动东干语演化为方言岛的重要社会因素。

### 3) 生活环境与经济限制

语言的传播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社会功能与经济价值。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实际需求，也深刻影响语言的社会地位与他人学习动机。在多语环境中，经济发展越活跃，语言之间的竞争与替代速度越快；反之，在社会流动性较弱的封闭区域，语言保守性更强，更易被孤立。

东干人初次进入中亚，多被安置在边缘乡村与偏远农庄，从事务农等社会初级生产活动。其所处地区经济落后、社会结构封闭、人口流动性低，大大减少了跟当地社会文化交融发展的机会，以及因经济条件和从事劳动内容的限

57) 关连，《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8) 马辰，〈白彦虎轶事〉，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https://www.sxlib.org.cn/dfzy/wszi/sxswszlsxg/rwzl\\_5204/grcj\\_5205/201701/t20170122\\_609564.html](https://www.sxlib.org.cn/dfzy/wszi/sxswszlsxg/rwzl_5204/grcj_5205/201701/t20170122_609564.html)(检索日期：2025.04.08)

制，降低了跟当地人语言沟通的必要性，因此，东干族被边缘化于国家主流社会之外。这种经济与地理上的双重边缘化，有效削弱了与当地主体民族语言的交际需求，在客观上构筑了一道“隐性隔离带”。也恰好解释了东干语中至今仍旧保留“大人”、“皇上”等旧称谓词汇的原因。这不仅是文化时间的“封存”，也是语言使用未被外部环境重塑的直接体现。此外，中亚各国本身居住环境多呈现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特点，东干族与当地其他族群的实际接触频率有限，缺乏高频交际需求，进一步限制了语言交流的深度与频度，阻碍了语言融合的自然发生。因此，生活环境与经济限制，削弱了语言替代的必要性。

前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各国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趋势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东干人开始外出就业与学习，有了掌握当地语言的必要，逐渐习得俄语、哈语等主流语言，东干语的社会使用频率逐渐降低。然而，长期处于发展缓慢地带的居民点，东干语依然是族群内部最主要的交际用语，其语言系统得以稳定延续，方言岛状态依旧稳固。

#### 4) 文化水平与语言劣势

除了外部社会结构因素外，语言自身的发展局限亦是造成东干语方言岛形成的重要内在原因。首先，东干语早期发展受制于东干人识字率低，文献记录能力有限。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口耳相传成为其主要传承形式，缺乏系统的文字记录与教育体系，导致东干语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规范。文字层面难以建立起与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交流、学习与接触，从而失去与主流语言进行书面互动、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可能。其次，虽后来借助西里尔字母创制了拼音化书写体系，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方面逐渐发育成熟，但其特殊的字母拼写结构使其不易被他族学习和理解。中亚其他民族对东干语能够进行拼读，但无法直观理解其语义；而对于汉语圈而言，虽然能大致听懂东干语的语音内容，却因书写系统完全不同，难以进行文字记录与表达。双重“互通障碍”使东干语在语言传播链中处于“沟通孤岛”的尴尬位置，因此，语言得不到互相学习、借鉴、

融合和更替。即便已有诸多优秀的东干文学作品问世，其传播与学术研究仍受制于语言进入门槛高、受众狭窄等限制，影响力难以突破族群边界。再者，东干语在使用人口上本就有限，族群规模小，且多集中于乡村区域，且东干人掌握的经济资源没有太大吸引力，语言缺乏强有力的经济与文化附加值，在多语环境中难以吸引他族主动学习。同时，由于其语言结构高度口语化、词汇体系复杂且区域内存在不同来源的方言差异，内部统一与标准化难度较大，提高了他人学习的难度，也限制其在更广泛语境中的传播与认同。

综合而言，东干语在文化基础、文字形态、传播机制与语言结构等多个维度都存在明显劣势，使其难以成长为一个通用性强、扩展性高的区域性语言，只能在特定的少数人群中被使用。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局限性，其语言形态在一个较为封闭的使用圈层中得以稳固延续，不具备大规模替代，也不易被其他强势语言完全吞没。东干语在传播力、学习成本、语言生态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弱势，使其在多语种环境中缺乏“语言竞争力”，从而更加依赖内部族群的自我维系而非对外扩展，在“向内巩固”的维度上维系了方言岛的稳定性。

语言的历史演变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深深植根于所处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中。东干语方言岛的形成正是多重社会文化因素长期交织作用的结果。首先，移民运动与军事战乱为东干语的迁移与地理隔离提供了根本条件，是方言岛形成的历史起点与基础；其次，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的差异，造成东干族与迁入地社会之间存在文化融合的断裂，加剧了语言被孤立的势态，限制了跨族群语言接触的可能；再次，东干族长期生活于经济发展滞后的边缘地区，缺乏社会资源与传播渠道，使得东干语难以与主流语言体系实现嫁接或转换，进一步削弱了语言替代的动力与必要；最后，语言自身存在文字体系特殊、使用群体狭窄等结构性弱势，阻碍其标准化与外延扩张。因此，在演化过程中，容易发生“被融合—被替代—被消亡”的主流语言演化路径，只能形成点状分布、族群自用、封闭传承的方言岛。

#### 4. 东干语方言岛的展望

回眸扎根中亚近160年的东干族发展历程，纵观东干语方言岛的演变轨迹，不难发现，东干语自形成之初便呈现出显著的保守性与稳定性。作为承载东干族文化、宗教、生活与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工具，东干语深深嵌入该族群的社会结构之中。当这些基本社会元素未发生根本性动摇之前，语言系统本身难以发生剧烈变革。因此，即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上，在时代的车轮碾压下，东干语的演变始终将沿着自身的内在逻辑缓慢推进，其发展走势将始终在预期轨道之内，鲜有“突变”或“异化”现象。

语言存在互相竞争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干族的年轻人因教育、就业、生存等现实需求，有了学习当地语言的必要，以及逐渐跟当地人杂居、通婚，迈入多语使用阶段，使这一原本操用东干语的单语群体被迫成为一个多数人都能够使用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多语民族。同时，与周边民族的文化界限也在日渐模糊。老一代人基本只能操东干语，则年轻一代多掌握俄语、哈语等现地语言，大多不再使用单一的东干语。

结合当前东干语发展状态与前人研究结果，可初步推断出东干语方言岛未来可能呈现以下三方面发展趋势：

(1) 语言杂糅使用趋势加强，外来词汇持续增加。在多语共处的语言生态中，东干语的开放性与适应性日渐增强，可能会吸收更多的俄语、突厥语等外来词汇来丰富自身内部语言系统，尤其在新生事物，如科技、媒体等领域的新词汇方面，将会更多地采用现地语言词汇进行表达。整体外来词的比例有望超过现有的15%，但旧有词汇作为民族语言特色仍在一定程度上将得以保留。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几年学术界对东干语的兴趣不断升温，例如，202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东干语词典》，语言记录与保护机制逐渐完善，东干语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护。尤其在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记录方式的多样化（如数字化词库、语音数据库等）趋势下，较为口语化的东干语用词将会被很好的记录保存，为东干语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全新可能。

(2) 语言“回流”趋势显现，与汉语的再融合趋势加强。东干语可能会融入更多当下的陕甘地区方言，以及朝现代汉语方向发展。随着东干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双语化进程与他语习得环境中，尤其年轻人凸显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开始逐渐恢复发展本民族语言，并不断形成民族语言保护意识与民族语言观。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不断增加，开始更加注重语言文化的发展。相较于俄语、突厥语等优势语言，依旧把东干语称作“亲娘语言”、“回族的根”<sup>59)</sup>。与此同时，许多失语或语言能力弱化的青年，选择赴中国西北高校留学以重拾母语。这种“语言回流”不仅能推动东干语结构性地向陕甘方言靠拢，也加速其与现代汉语的再融合。尤其近年来，在相关政策帮扶下，中国西北地区各大高校的东干族留学生数量持续上升，如西北师大专门设立了东干族学习班。加之中国跟中亚各国的交流日趋频繁，东干族留学生就业前景更加明亮，刺激更多人前往中国留学。这批年轻人将新鲜血液注入其中，势必会影响东干语向现代汉语方向靠拢。

(3) 东干人语言转用现象增多，东干语使用空间逐渐收缩。东干语终究可能仅仅会成为东干人内部使用的方言，今后也不会发展为具有很大优势的地方新语言。在现实社会中，东干人被迫选择语言转用，为了融入主流生活环境，使用具有社会优势的突厥语或俄语，因此，东干语的需求逐渐降低，语言适用范围也逐渐萎缩。根据笔者对哈萨克斯坦东干族留学生的观察，他们之间的日常交流多采用哈语，东干语仅作为一种只在家庭环境中才会使用的方言土语。但有学生表明现在东干家庭对孩童语言教育跟过去有所变化：幼年语言发展阶段自然习得的语言除了东干语，还有俄语、哈语，与家人日常交际中会用到东干语，或者是当地的方言夹杂着东干语；有部分东干族孩童选择上东干语学校，但校内交流沟通多为东干语与俄语交叉使用。

如今，随着东干人逐渐跟当地人通婚，外貌特征与中亚人日益趋同，甚至很难以外貌来识别东干人。因此，随着族人的轻老交替，东干语虽然能得到一定的保护与发展，但终究仅会稳定在“民族内部家庭交流语言”的功能层级上，不

59) 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太可能发展为具有广泛区域通用性的新方言或优势语言。

东干语是一个民族时代变迁的驻足，也是中国回族迁往境外后语言文字斗争与发展的盛宴，它流露出东干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变化与生存回响，也留存了该民族深深的时代痕迹。因此，对东干族与东干语的发展依旧有无尽的可能与希望。

## 5. 结论

无论从东干语的历史渊源、语言本质，还是其变异程度，亦或东干族民族心理认同来看，东干语仍属汉语的一个分支或变体，而非独立语言。尽管其书写系统采用西里尔字母，表面与斯拉夫语系语言相似，但其核心语法结构、音系特征和词汇系统仍深植于汉语西北方言之中，其核心仍属于汉语方言范畴。

东干语方言岛与传统意义上的“方言岛”概念存在一定差异。作为一种跨境传播的语言变体，该方言岛是中国西北汉语方言在突厥语与俄语语言环境中被孤立而形成的特殊汉语飞地。过去与汉语其他方言的直接接触几乎完全中断，其语言环境更加孤立。其语言系统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词汇的多源杂糅、语音的显著变异、以及书面语风格的高度口语化。

东干语方言岛的形成，不仅与语言本身的发展有关，更深受多重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主要归因于三次大规模移民运动和多次军事战乱，为语言迁移与地理隔离提供了基本条件；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差异，在社会层面上强化了东干族与周边民族的隔离，阻碍了语言接触与融合；生活环境的闭塞与经济滞涩，减少了语言替代与融合的需求，使其方言岛状态得以延续；以及东干语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使东干语难以扩展为主流通用语言。

预测今后东干语大致朝三个方向发展：第一，突厥语、俄语等外来词汇将不断增加；第二，会趋向现代汉语方向发展；第三，仅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内部使用语言被保留，不会发展为具有很强社会价值优势的实用性语言。

## 参考文献

-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杜松寿,《拼音文字研究参考资料集刊:东干语拼音文字资料》,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
- 金宜久,《伊斯兰教小词典(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 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林涛,《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林涛,《东干语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4年版。
-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修订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孙宏开,《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 熊贞,《陕西方言大词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张中夏,《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
- 程娜,《哈萨克斯坦东干族中高级商务汉语学习者口语语序偏误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 库吐乐阿依·居来提,《东干族留学生初级阶段汉字习得偏误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 李阳阳,《东干语词汇研究》,北方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 苏博乐,《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族·东干族源流考述》,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 曹茜茜,〈探析《三娃儿连莎燕》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女性形象〉,《大众文艺》第11辑,2023年。
- 符晓洁,〈试论同治陕西回民事变的影响〉,《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輯, 2015年。

葛维达·茨布兹金, 〈卡拉库努孜:回族在俄国的早期定居点〉, 《西北民族研究》第4輯, 2015年。

海峰, 〈东干语概况〉, 《民族语文》第1輯, 2002年。

侯宇, 〈中亚东干语传承危机与保护路径探析〉, 《丝绸之路》第4輯, 2023年。

李如东, 〈在地化与礼仪变迁——中亚东干人婚姻礼仪之争中的社会、文化与族群观念〉, 《开放时代》第4輯, 2024年。

林涛, 〈中亚东干语及其发展状况〉, 《北方语言论丛》, 2011年。

林涛, 〈东干语与北京话及西北方言的比较〉, 《北方语言论丛》, 2012年。

刘俐李, 〈东干语(陕西支)声调共时差异实验研究〉, 《民族语文》第5輯, 2013年。

莫超, 〈“东干”族名稽考〉, 《文化艺术研究》第1輯, 2024年。

齐雪艳·吴晓杭, 〈论亚瑟儿·十娃子诗歌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 《边疆经济与文化》第3輯, 2023年。

王瑞·王东, 〈中亚东干族传统服饰保存与传承现状调查〉, 《民族艺林》第1輯, 2019年。

吴勇毅, 〈东干人语言传承对中文国际传播的启示〉, 《华侨华人学研究》, 2023年。

澎湃新闻: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76315&from=kuaibao](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676315&from=kuaibao)

长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http://mw.changchun.gov.cn/ztzl/ccmz/mzwh/201510/t20151029\\_1035331.html](http://mw.changchun.gov.cn/ztzl/ccmz/mzwh/201510/t20151029_1035331.html)

凤凰资讯: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bupingdengtiaoyue/news/200808/0801\\_4259\\_689826.shtml](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bupingdengtiaoyue/news/200808/0801_4259_689826.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jyb\\_sjzl/wenzi/202108/t20210827\\_554992.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wenzi/202108/t20210827_554992.html)

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cn/m/gj/2016/11-08/8056669.shtml>

RadioFreeEurope/RadioLiberty：

<https://www.rferl.org/a/kazakhs-start-returning-home-from-kyrgyzstan-after-weekend-ethnic-violence/30425913.html>

## Abstract

### The Evolution of *Dungan* Langua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ormation of Its Speech Island

Chen Jiwen · Na Min Gu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Dungan* langua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underlying cause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its unique cross-border speech islands resulting from migration.

The *Dungans* are a distinctive ethnic group that traces its roots to late *Qing*-era *Hui* Muslims from China's northwestern provinces, who migrated to regions such as Kazakhstan and Kyrgyzstan due to ethnic conflict and political upheaval.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y have evolved into a community that embodies both the cultural imprint of northwestern China 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Asia.

*Dungan*, a Sinitic language of the Sino-Tibetan family, developed from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Through the efforts of *Dungan* scholars, it adopted a unique writing system based on Cyrillic script, which has been preserved and passed down through literary works and cultural practice.

Furth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of the *Dungan* speech island from a language contact perspective. As the *Dungan* people migrated across borders, their native dialects became geographically and culturally detached from the Chinese linguistic core. Isolation, coupled with endogamous traditions and limited contact with surrounding Russian and Turkic languages,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a linguistically enclosed "island"—a dialect enclave evolving in relative independence.

Finally, the paper outlines potential trajectories for the *Dungan* language, proposing that this case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iasporic languages in cross-cultural and multilingual contexts.

**Key words :** *Dungan* ethnicity, *Dungan* Language, speech island, *Hui* ethnic group,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Shaanxi-Gansu* dialects

투 고 일 : 2025. 4. 10. / 심 사 일 : 2025. 4. 15.~ 2025. 5. 15. / 게재 확정일 : 2025. 5. 20.

